



國家「算力網」布局 香港須抓住算力經濟機遇

何瑋磊

議論風生

2026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將算力網與水網、新型電網、新一代通信網等並列納入國家「六網」建設布局，正式確立算力作為國家級戰略基礎設施的重要地位。繼移動通信網絡重組消費互聯網格局之後，全國一體化算力網正開啟人工智能驅動的全面經濟周期。國家堅持全國一盤棋統籌布局算力體系，既能在短期內形成強大產業集聚效應，也能在企業端、消費端打通完整市場落地路徑，成為「十五五」時期穩增長、育新機的核心新動能。這是國家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抓手，也為香港依託自身優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難得的時代機遇。

一、算力網：AI經濟時代的基礎公共底座

算力網的核心價值，在於打破各地算力資源碎片化、孤島化的現狀，搭建起一點接入、全網調度、按需使用的智能化算力基礎設施。它並非簡單的數據中心，而是依託國家級調度平台，整合全國超算、智算與邊緣算力節點，實現資源動態配置、高效協同。

依託國家統籌布局優勢，算力使用成本持續下行。國產大模型API調用價格近年大幅回落，百萬Token使用成本顯著走低，大幅降低了企業和市場布局AI應用的試錯與運營門檻。展望未來，隨着算力網全域建成完善，AI普及應用成本仍有較大下行空間。如同水電成為工業時代的基礎要素，算力正逐步變身數字經濟時代的通用公共資源，從高端技術供給轉向全社會普惠共享。

二、增長邏輯清晰：產業集聚與市場需求雙向共振

不同於諸多尚停留在概念層面的新興產業，算力網的經濟拉動邏輯已完全落地成型，供給端集聚效應凸顯，需求端企業與消費市場雙輪並進。

供給層面，國家重點推進的「六網」新型基建，持續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協同發展，覆蓋芯片、服務器、光模塊、數據中心建設及算法研發、數字服務等全鏈條。目前全國八大算力樞紐周邊已形成明顯產業集聚，大批科創企業向樞紐節點集聚，依託低成本算力加速數字化轉型。在工業領域，AI賦能智能製造已初步落地，有效提升生產效率、降低能耗成本，成為傳統

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

需求層面呈現企業級、消費級雙向爆發的格局。一方面，各行各業成熟企業與初創企業都在推進業務流程AI重構，融入生產、管理、營銷全鏈條，AI應用具備清晰的商業價值與轉化路徑，落地意願強、見效快；另一方面，消費端AI產品加速普及，智能終端、沉浸式數字服務等業態持續擴容，市場需求穩定增長，為算力經濟提供了廣闊的終端應用空間。

三、中國模式獨有優勢：算力公共化賦能全域實體經濟

部分經濟體由少數科技企業主導算力資源，而我國則將算力網納入國家級公共基礎設施統籌布局，通過全域統一調度避免資源壟斷，讓算力普惠紅利直達實體經濟各行各業。

這種公共品屬性賦予了算力經濟極強的帶動效應，業內權威研究普遍指出，算力產業具備極強經濟槓桿效應，每投入1元算力基建，往往能帶動3至4元的GDP增量。中長期來看，隨着算力網絡持續完善、應用場景不斷豐富，算力經濟將持續拉高數字經濟滲透率，成為「十五五」期間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產業結構的穩定支柱。

依託規模化布局與統籌調度優勢，我國算力綜合成本保持領先，為產業智能化、數字化升級築牢底座支撐。

四、香港機遇：契合「十五五」定位發揮所長多維發力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等中心，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地位，而算力網建設浪潮，恰好與香港既有定位高度契合，可錯位發展、多點布局、精準補位。

香港可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算力樞紐定位，用好本地已落地重大算力基建項目。中國移動環球智算中心已正式投入運營，潤澤（沙嶺）智算中心亦已啟動建設，香港可順勢形成「內地主攻模型研發訓練、香港承辦全球商用服務」的跨境算力分工格局，憑藉優質國際網絡的低時延優勢，打造聯通內外的跨境智算樞紐。

同時香港可借鑒國際調解院落戶本地的獨特優勢，依託接軌國際的普通法制度與「一國兩制」特殊地位，參與全球AI規則與跨境數據治理，搭建兼顧內地監管要求與國際通行慣例的AI合規體系，完善跨境AI相關爭議調解與仲裁服務，建設跨境

人工智能治理交流平台。

香港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專長，探索發行基礎設施REITs等多元化金融工具，為全國及大灣區算力基礎設施引入國際資金，以綠色金融助力算力產業低碳化發展，拓展算力要素市場化金融配套服務。

此外香港依託國際經貿樞紐角色，助力內地AI技術、算力服務規範化出海，暢通跨境數據安全有序流動；依託大灣區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相關實踐，穩妥推進跨境數據流動白名單探索，打造安全高效的跨境數據要素流通節點。

算力網建設是「十五五」時期新基建的核心抓手，更是支撐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關鍵引擎。隨着國家「六網」建設全面鋪開，算力經濟發展的時間窗口已然開啟。香港立足自身法律、金融、國際化聯通優勢，多維度參與國家算力網絡建設，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精準發揮自身所長，既能助力自身經濟多元轉型，亦可持續鞏固「超級聯繫人」角色，在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大局中實現協同共贏、長遠發展。

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聯盟會員、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金融會計行業委員會委員

五年規劃提升香港國際爭議解決中心角色



劉洋

「國家規劃」與「本地規劃」：香港治理模式的結構性升級

特區政府首次制定香港五年規劃，標誌着香港在治理邏輯與政策體系上的一次結構性升級。從依託年度施政報告的短周期政策規劃，轉向有中長期目標、跨部門協同的系統化布局，這是香港向「規劃引領發展」治理模式轉型的重要標誌。這種制度性的轉變，直接呼應了國家「十五五」規劃對香港的最新戰略部署。

規劃在港澳專章中以「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為主題，提出要「發揮港澳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同時，將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和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首次納入國家規劃層級，賦予香港在國家現代化格局中的新使命。

香港五年規劃正是在這一項層設計下的戰略承接，是將國家「十五五」規劃中的系統願景落地為具香港特色的實施路徑。它不僅是政策銜接的技術動作，更是香港治理方式的理念更新：從部門分治走向整體協同，從單點突破走向系統治理，從政策執行走向制度創新。

因此，香港五年規劃不是一份地方發展文件，而是一場治理模式的再造。在新的制度語境中，法治建設既是規劃落地的前提條件，也是推進「由治及興」向「高質量發展」跨越的制度支點。

「法治條線」嵌入規劃：從支撐工具

到治理核心

在香港五年規劃的總體布局中，法治已不再被單純視為經濟活動或社會管理的配套機制，而被確立為橫向貫穿各領域的制度支柱。其意義不只在於支持市場有序運行，更在於為香港的治理創新提供穩定的制度坐標。

中央在各個決策中，將「推進涉外法治體系化建設」列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方向。這一方針為香港提供了清晰的制度定位：在建設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基礎上，實現從「建設」到「深化」的全面躍遷。對香港而言，這意味着法治工作要從「規則依附」邁向「能力塑造」，通過制度協同、人才培養與國際參與三方面，推動治理體系的系統升級。

首先，法治的功能要從「體系建設」走向「能力建設」。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不只在於擁有成熟的普通法制度和司法機制，更在於能把立法、司法、行政、公共服務貫通成一個高效、可預期、能復用的治理體系。

其次，香港需要把法律領域的外部競爭力，轉化為內部協同力。五年規劃應成為促進跨法域「制度接口」常態化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推動內地與香港在民商事判決互認、破產重整、知識產權保護、數字資產監管等高技術法域探索機制聯通，為大灣區法治一體化提供制度範例。

同時，香港應當把自身的法律服務實踐，提煉為可借鑒的制度供給能力，將「香港經驗」上升為國家參與國際法治進程的結構性資源。這不僅關乎提升自身競爭力，更是國家涉外法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個意義上說，法治已不是五年規劃中獨立的一項任務，而是規劃目標能否可信、政策執行能否持續的制度前提。香

港若能以法治邏輯嵌入每一項政策設計，不僅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確定性，也能在複雜多變的全球格局中體現一種可驗證的治理自信。

從「接口」到「節點」：規劃語境下的香港法治再定位

「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被正式納入國家「十五五」規劃表述，意味着香港的法治角色已經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功能分工，進入制度定位的重塑階段。過去，香港更多扮演國際法律體系與內地之間的接口角色，是中國法治與世界規則的交匯點；而在新一輪國際戰略布局中，香港被賦予「節點」的使命：不僅要連接，更要協同與輸出，成為聯通國家法治戰略與國際法治秩序的中樞樞紐。

這種轉變的基礎，並非源於規模或資源，而在於香港獨特的制度兼容性。作為大陸法系國家中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轄區，香港在語言體系、法律制度與國際實踐上，具備天然的橋樑屬性。其雙語法律環境和開放司法文化，使之能夠在遵循國家憲制框架的同時，以國際社會熟悉的法律邏輯表達和傳遞中國法治理念。正是這種「二元結構」賦予了香港制度的彈性與延展性，使其不僅是規則的使用者，更是跨體系溝通的設計者與闡釋者。

未來五年規劃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鞏固這種制度功能，將香港定位於國家涉外法治體系的重要橋樑、全球法律治理網絡的功能節點，以及展示中國法治自信的國際平台。其核心方向，是通過法治制度的開放與創新，強化與國家法治體系、國際商事規則的雙向對接將香港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能力向外延展的現實通道。

由此可見，香港的法治再定位不只是身份的轉變，更是一種職責的延伸。它代

表着中國法治體系的外向功能，也體現着「一國兩制」在法治層面的深度實踐。香港從「接口」走向「節點」，正是從單向承接邁向雙向互動、從規則使用者邁向規則塑造者的過程。這一角色的成熟，將決定香港在新的國際法治格局中，能以何種方式繼續體現國家戰略的前瞻布局與制度自信。

制度競爭時代：以「信任」構築香港方案

當全球法治秩序的競爭從規則之爭轉向制度能力之比時，香港的真正優勢，不在地理區位，也不止專業積累，而在於一種長期沉澱的制度資產——信任。

信任是香港法治體系最核心的無形資本。它首先來自穩定透明的普通法機制，使社會和市場形成了可預期的法律環境；同時，也來自中央對香港法治原則的持續信任與制度性保障，讓「一國兩制」在法治層面擁有了堅實支撐。同樣重要的是，香港在國際社會建立起高度信譽，其仲裁裁決在170多個《紐約公約》成員國得到承認與執行，司法公信力延伸至全球。這種多層次、複合型的信任，使香港在制度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保持了罕見的跨體系公信力。

然而，信任並非靜態存在，而是一種需要不斷重塑和再生產的制度關係。五年規劃的推進，就是確保這種信任能在治理體系內部持續循環的關鍵契機。香港需要在規劃框架下進一步完善商事法律協作與互認機制，擴大跨境爭議解決平台的開放度，並加快法律科技在仲裁、調解和證據管理等領域的應用與創新。通過讓「信任一規則一制度」形成良性互動，香港可以將制度穩定性轉化為長期發展韌性。

這種以信任為核心的制度邏輯，本質

上是一種新的治理思維。它強調開放與確定性的平衡，以法治穩定支撐政策創新，以制度透明贏得全球可預測性。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與地緣競爭的加劇，香港能否保持獨特競爭力，最終取決於能否讓信任成為一種有組織的制度能力，而非僅僅一種社會印象。

以規劃為橋，以法治為勢

香港制定五年規劃，不僅是政策層面的創新，更是治理文化的一次現代化轉折。它標誌着香港正在從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政策邏輯，邁向以法治、制度與治理質量為核心競爭力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在世界進入制度競爭與秩序重構的關鍵時期，香港的優勢必須體現在「確定性」與「開放性」的兼容之中。五年規劃提供了戰略框架，而法治則構成了這一框架的運作邏輯與可信前提。只有當規劃中的每項政策、每個目標都能夠嵌入法治邏輯、體現制度自治性，香港的治理體系才能真正體現現代化水準，也才能在全球不確定性中提供穩定預期。

未來五年，法治不僅是香港行政能力的支撐，更是塑造國際形象、延伸國家治理影響力的關鍵語言。它既是香港制度自信的表達方式，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舞台上可信傳達的一個窗口。

香港的競爭力，不止於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在於以制度立信、以法治定向、以規則取勢，在國家發展大局與全球治理體系之間，持續扮演那個能把規則轉化為信任、把信任延展為秩序的關鍵節點。這正是香港在「十五五」時期最深層、也最具時代意義的核心價值。

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律政司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專家委員會委員

中美俄大三角棋盤上的歐洲尷尬

宇文

看大勢

5月19日晚，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這是普京總統第25次到訪中國。普京在出發前發表視像講話，指出俄中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堅信兩國會繼續攜手竭盡全力，深化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維護全球安全與穩定。

4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剛剛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兩國關係的新定位，就下階段高層交往和外交、經貿、兩軍、執法等各領域對話合作作出規劃，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在全球地緣政治動盪不斷、經濟復甦乏力背景下，中美元首建設性、戰略性溝通，向全球釋放積極信號，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短短一周內，美俄元首相繼訪華，清晰折射出當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轉變，凸顯了中國在世界百年變局中的大國定力和獨特作用。在全球外交的大棋盤上，以中國為「頂點」的中

美俄大三角關係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相比之下，歐盟這一「極」卻顯得焦慮與落寞。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日前在愛沙尼亞塔林一場會議上聲稱，中美俄三方都「不喜歡」一個團結強大的歐盟，並試圖分裂歐洲。如此說辭，與其說是埋怨中美俄三國，實際上卻難掩歐盟尷尬的「怨婦」心態。

歐洲飲下自釀苦酒

卡拉斯的論斷顯然有些偏狹狹隘。一個真正團結而強大的歐盟，理應是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一極，中美俄三方沒有理由排斥。然而，歐盟的官僚主義行為模式卻越來越讓世界看不懂。對美國，歐盟極盡逢迎，這種刻板虛偽的「白左」倨傲卻遭遇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衝擊，除了被關稅和安保詭詐，還以格陵蘭島對歐進行羞辱。對俄羅斯，在俄烏衝突的和平進程談判中，歐盟已被徹底邊緣化。而且，對俄制裁也讓歐盟陷入能源供給尷尬。

歐盟對中國企業頻繁發起反補貼調查，卻對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的「政府補

貼」保持沉默；要求中國「公平競爭」，卻將中國綠色產能拒之門外。這種雙重標準，讓歐盟在國際舞台上信譽盡失。

顯然，歐盟的尷尬處境與焦慮並非來自外部壓力，而是飲下自釀苦酒。歐洲經濟停滯在於自身政策結構性矛盾。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歐洲長期面臨投資不足、資本市場碎片化、高能源成本和監管過度複雜等系統性癥結。造成這些問題的顯然不是中國、美國和俄羅斯，而是歐盟臃腫的官僚主義體制以及各成員國的一盤散沙。特別是，歐盟一邊標榜自己是「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一邊在關鍵領域步步設限；一邊在《歐洲氣候法》中設定雄心勃勃的減排目標，一邊卻將中國優質綠色產能拒之門外，這種分裂政策不僅抬高了自身綠色轉型的成本，更嚴重損害歐盟的國際信譽。

更諷刺的是，在俄烏衝突的和平進程談判中，歐盟已被徹底邊緣化。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承認，美俄烏三方談判幾無進展，卻讓歐盟「靠邊站」，可能被迫接受一份歐盟並不認可的協議。德國總理默

茨表示，歐洲「準備好坐到談判桌前」，但沒有人邀請歐洲入座。此外，跨大西洋關係正經歷一場深刻的信任危機。特朗普政府對歐洲鋼鋁產品徵收的50%高關稅持續生效，美國還多次在重大軍事行動前不通知歐洲盟友。從金融依賴到軍事依賴，再從貿易摩擦到被背信棄義的貿易協定架空，歐盟越來越像一個「被掏空核心功能的邊緣配角」。

「既要又要」邏輯行不通

在中美俄大三角棋局中，卡拉斯的「受害者敘事」顯得蒼白而無奈。對美國而言，歐洲是一個可以隨時施壓卻不必付出代價的盟友；對俄羅斯而言，歐盟已不再是不可忽視的調解力量；對中國而言，一個不斷築起貿易壁壘的歐盟，正在消耗自身作為多極化世界中的戰略價值。歐盟的尷尬在於，並非中美俄不喜歡一個團結強大的歐盟，而是三國不再相信歐盟有能力真正團結歐洲。

中歐關係正站在危險的十字路口。雖然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斯塔默、德

國總理默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歐洲領導人密集訪華，實際是個別歐洲國家在務實修補雙邊經貿短板，與歐盟毫無關係，而歐盟則不斷在中美之間進行高風險的對沖博弈。海關總署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中歐貿易額達2.0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2%。中歐經濟捆綁之深決定了任何「搞牆」行為都將給雙方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

但歐盟並未參透這個基本道理。一邊忙於出於對華強制採購限制和貿易調查，一邊又盼着中方在氣候治理和全球公共衛生等議題上伸出援手，這種「既要又要」邏輯，最終買單的必將是歐洲企業和消費者的切身利益。卡拉斯的「怨婦」表態，應該質問的不是中美俄，而是歐盟自己。當自詡為「規則制定者」的歐盟，不斷背棄多邊主義原則時，憑什麼要求別人尊重它的團結與強大？

中美俄大三角的棋盤已經鋪開，棋手們正從容落子，而歐盟卻在棋局邊緣焦急踱步。與其尷尬和焦慮，布魯塞爾更應反躬自省。國際關係學者